

## 《左传》“荆尸”与楚月名

李 学 勤

1975年末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竹简《日书》甲种，其中有秦楚月名的对照表<sup>①</sup>，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。楚月名自成系统，如秦十月即亥月楚名“冬夕”，秦十一月即子月楚名“屈夕”，秦十二月即丑月楚名“援夕”，秦正月即寅月楚名“刑夷”，等等，学者们作了很多讨论。其间有的论著指出，楚月名可能有很早的来源，具体说，即寅月“刑夷”（其他楚文字材料或作“翟尸”等）见于《左传》，作“荆尸”，共有两例<sup>②</sup>。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，但尚有可补充之处。

第一个例子见庄公四年传，文云：“四年春王三月，楚武王荆尸，授师于焉，以伐随。将齐（斋），入告夫人邓曼曰：‘余心荡。’邓曼叹曰：‘王禄尽矣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。先君其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无亏，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’王遂行，卒于柂木之下。”

鲁庄公四年是楚武王五十一年，相当公元前690年。传文的“荆尸”，杜预注释为“陈兵之法”，孔颖达疏引申云：“楚本小国，地狭民少，虽时复出师，未自为法式。今始言荆尸，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，名曰荆尸，使后人用之。”“荆尸”一词与我们看到的月名有关，是肯定的，据《日书》的表，该月正相当建子的周正的三月，也似与传文相应。

不过，庄公四年的实际历时并不是建子，而是建丑<sup>③</sup>。这以经文

有“六月乙丑”即能证明。如建子，六月癸酉朔，无乙丑日；建丑，六月癸卯朔，乙丑即二十三日<sup>④</sup>。据此，传文的“春王三月”实为卯月。如果说“楚武王荆尸授师于焉”作一句读，“荆尸”指寅月，就没有理由接在“春王三月”之下。实际上，把“荆尸”解为月名，放在“春王三月”下面，是不通顺的。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介绍了楚月名的说法，而仍说“疑此‘荆尸’当作动词，指军事”，基本上倾向杜预注，大概就是从文例考虑的。

第二个例子见宣公十二年传，文云：“十二年春，楚子围郑，旬有七日。郑人卜行成，不吉；卜临于大宫，且巷出车，吉。国人大临，守陴者皆哭。楚子退师，郑人修城。进复围之，三月，克之。”“夏六月，晋师救郑，……及河，闻郑既及楚平，桓子（荀林父）欲还，……随武子（士会）曰：‘善，会闻用师，观衅而动，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不易，不可敌也，不为是征。楚君讨郑，怒其贰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、刑成矣。伐叛刑也，柔服德也，二者立矣。昔岁入陈，今兹入郑，民不罢劳，君无怨觎，政有经矣。荆尸而举，商、农、工、贾不败其业，而卒乘辑睦，事不奸矣。……’”

宣公十二年是楚庄王十七年，相当公元前597年。“楚子围郑”一事，经传均云“十二年春”，未明记月分。这一年经文有“夏六月乙卯”、“冬十有二月戊寅”，互相矛盾。杜预注云：“十二月无戊寅，戊寅十一月九日”，孔颖达疏则说：“案传称‘师人多寒，若是十一月，则今之九月，未是寒时，当月是而日误也。’今推十二月辛未朔，戊寅初八日<sup>⑤</sup>，是该年建子，这从前后各年都建子看，应该不误，所以‘六月乙卯’是有错的。”

杨注说“三月，克之”的“三月可有二义，一为季春三月，一为历时三阅月，此为第二义。”引孔疏：“知非季春克之者，下云六月晋师救郑，及河，闻郑既及楚平，桓子欲还，是将欲至河，郑犹未败。至河闻败，犹欲还师，在国闻败，师必不发。若是季春克之，不应比至六月而晋人不闻，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。”又云：“经传皆言春围郑，不

知围以何月为始。围经旬有七日,为之退师,闻其修城,乃复更进,进围三月方始克之,则从初以至于克,凡经一百二十许日,盖以三月始围,至六月乃克也。”结合传文下面的“荆尸而举”,似乎“荆尸”正好是三月,与楚月名相合。

仔细想来,这里仍然是有问题的。传文“荆尸而举”,“举”指举兵,即军力的动员。楚军动员启程,以至开始围郑,要有一段时间,第一次围郑,又有十七天,随后退师,再进而复围,还得有一段时间。况且传文明言“进复围之,三月,克之”,是第二次围郑历时三月,不是从举兵到克郑只有三月。孔疏估计“从初以至于克,凡经一百二十许日”,即四个月以上,是合情理的,他所讲“三月始围”乃指第二次围郑而言。这样看,楚的举兵不可能在寅月。

品味“荆尸而举”数句,“荆尸”也不像是月名,而应是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。正因行用“荆尸”,才做到“商、农、工、贾不败其业,而卒乘辑睦”,庄公四年传杜注释“荆尸”为陈兵之法还是不中不远的。

这么说,是否《左传》的“荆尸”同楚月名全不相干呢?我认为不是的。楚月名各个的涵义,我们还不清楚,似若与各月行事,或者历史上一定事件有关。“荆尸”之月可能宜于征召兵员,也可能过去曾在该月有一次著名的举兵之事,后来楚月名的“刑夷”还是由春秋时的“荆尸”而来。

### 注:

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第190—191页,文物出版社,1990年。

②《于豪亮学术文存》,第160—161页,中华书局,1985年。《曾宪通学术文集》,第183—185页,汕头大学出版社,2002年。

③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第162页,中华书局,1990年。

④张培瑜:《中国先秦史历表》,第69页,齐鲁书社,1987年。

⑤同③,第717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